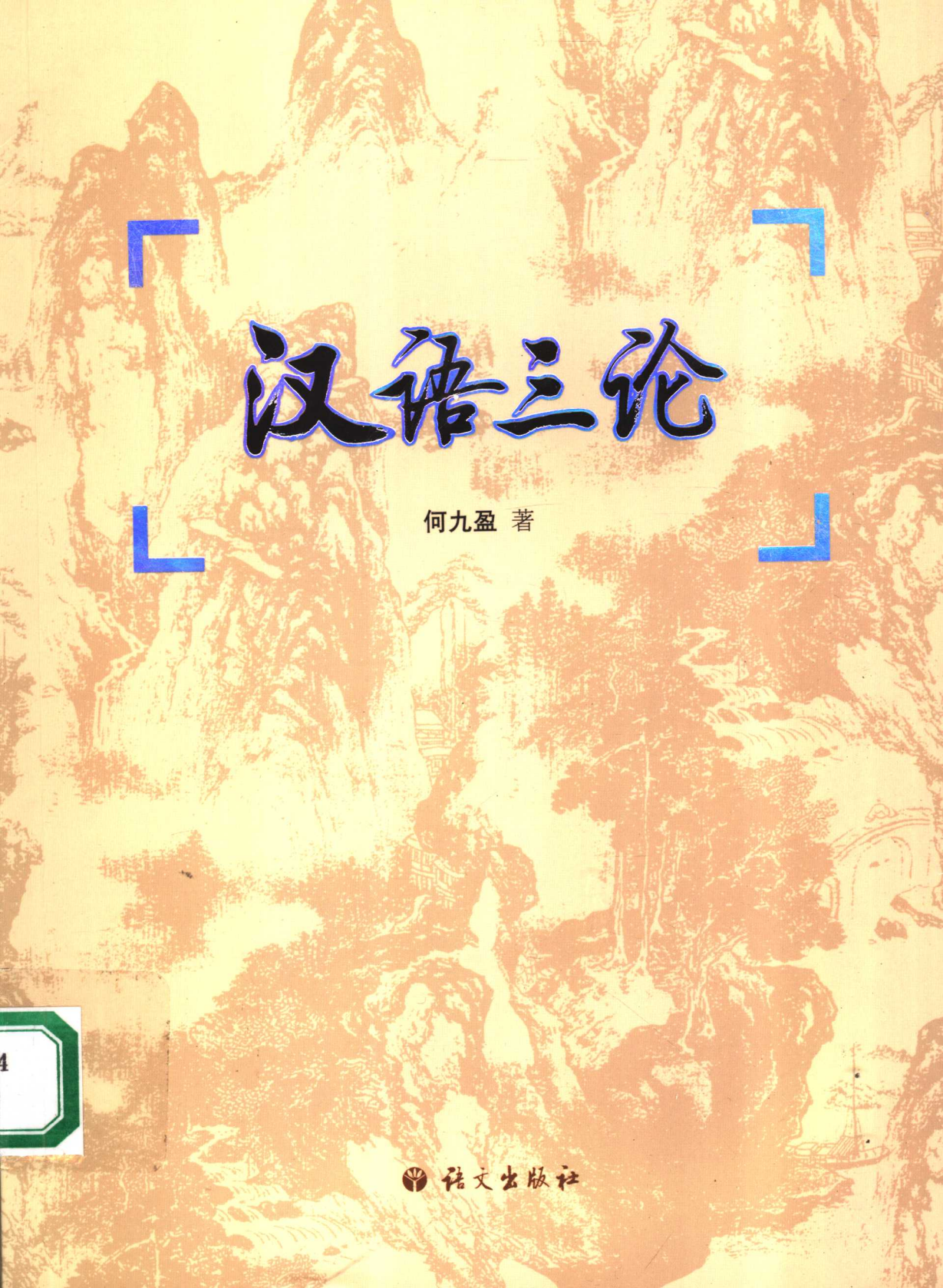




汉语三论

何九盈 著

 语文出版社

此書係由重慶聯合書文大不語音譯家國改題本
目前於博大重對平100(1)中交博書館新設(北大京北)
10004791326110 學部出刊題

汉语三论

何九盈 著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三论/何九盈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80184 - 774 - 4/H · 66

I. 汉… II. 何… III. 汉语-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0688号

汉语三论

何九盈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异16开本 23印张 327千字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4.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几点说明

一、这是三篇在内容上相对独立的论文，旨在研究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历史，普通话的历史，汉语如何走上世界等问题。这三大问题互有联系，故合为一书，名曰汉语三论。

二、《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一文，在定稿过程中，邵永海、杨荣祥两位先生曾提出宝贵意见。

三、2004年2月我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邀请，赴该院访问，曾以《转向》一文演讲。丁邦新、张洪年、孙景涛、张敏、朱晓农、杨荣祥、张军等先生，不吝赐教。此后，又应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宋绍年教授邀请，以此题作学术演讲；听讲同学及邓骏捷等先生亦有赐教。

四、2004年2月24日，我应邀赴香港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演讲，从《论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一文摘取部分内容，题为《母语与现代民族》作为讲词。承系主任单周尧教授、李敬忠教授和于昕先生及多位同学不吝赐教。

五、这三篇论文从构思、写作到定稿，历时近四年。每一立论，必有多种材料为据，而大量资料均属新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资助，为此课题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

六、对以上提到的给予本课题以各种各样帮助的单位或个人，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何九盈

2005年9月4日

目 录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

——兼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来源

引言	(1)
壹、何谓“语文转向” 中国语文为什么要转向	(3)
一、语文教育老化	(6)
二、书面话语老化	(7)
三、应试文体（八股文）老化	(8)
四、缺少语言规范	(10)
五、语言观老化	(11)
六、汉字老化	(13)
贰、中国语文转向的五個阶段	(14)
一、中国语文转向第一阶段（1862—1894）	(17)
二、中国语文转向第二阶段（1894—1917）	(23)
三、中国语文转向第三阶段（1917—1949）	(31)
四、中国语文转向第四阶段（1949—1979）	(45)
五、中国语文转向第五阶段（1979— ）	(52)
叁、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三个来源	(67)
一、翻译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	(68)
二、文言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	(82)
参考文献	(113)

论普通话的发展历史

壹、现代汉语“普通话”定义的演进	(118)
一、从 1955 年的决议到 1956 年国务院关于“普通话”的指示 ..	(118)
二、关于普通话定义的争论	(121)

貳、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历史来源	(126)
一、钱玄同、杨耐思、林焘、俞敏、李新魁、鲁国尧等人的看法	(127)
二、分歧的原因与应思考的两个问题	(129)
三、决定官话地位的三个条件	(139)
叁、汉语普通话发展史鸟瞰	(150)
一、先说“雅言”的基础方言是河洛话	(151)
二、第二个问题：两个南北朝与“普通话”的传播	(155)
三、第三个问题：入声是区分中古与近代普通话语音的重要标准	(178)
参考文献	(193)

论全球化时代的汉语意识

壹、问题的提出	(196)
一、什么是全球化	(197)
二、什么是汉语意识	(206)
三、全球化与汉语意识之间有什么关系	(209)
貳、母语意识	(213)
一、母语意识是近代民族的产物	(213)
二、台湾的两次母语危机	(239)
三、海外华人的母语意识	(247)
四、大陆内地的母语意识	(255)
叁、传播意识	(273)
一、语言的两种身份	(273)
二、汉语传播意识的发展过程	(278)
三、传教士与汉语传播	(294)
肆、民主意识	(335)
一、为什么要对语言讲民主	(336)
二、语言民主意识的两个层面	(343)
伍、规范意识(略)	(351)
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55)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

——兼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来源

提要：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学语言）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从未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总结。本文实际上是一篇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史论，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全过程，划分出五个发展阶段，对各阶段的特点作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三个来源。着重探讨了翻译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文言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这两种关系，本文从事实出发，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引言

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 21 世纪，回望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现实眼光和历史眼光来研讨中国语文的转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140 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与中国文明模式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如中国现代化是命定的也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一样，中国的语文转向，同样是命定的、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从清末开始，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文言转向白话，由语言封闭转向大开放大吸收，是中国语文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百余年的语文新潮，波涛壮阔，汹涌澎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确立了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书写体系、新的思维模式，这是中国文化

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无论怎么评价其意义都不算过分。

语文转向涉及到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潮起潮落，有主流也有逆流，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完美事物。药能治病，而药都有毒。语文转向给中国语文造就了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是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呢？尤其是在跨语际交流、跨文化对话中语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汉语怎么由弱势语言变为强势语言呢？这些都牵动许多人的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比较安定了，文化人的日子比较好过了。于是，旧文化的“乡愁”不由得阵阵袭来。有人赞美文言，贬抑白话，提倡读经，主张回归传统，以此作为拯救传统的妙方。回归传统并不就是复古，并不等于保守，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语文生态环境有诸多不满，眼看英语独霸天下，汉语地位今不如古，语言污染日益严重，语文滑坡之势几乎无法逆转。中年以上的文化人，“语文忧患意识”、“母语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乡愁加新愁，汇合为一个主张，这就是一位现代诗人提出的：

重建汉语自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这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诗人于坚语。转引自王耀文《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问题》，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8日《国际文化版》）

汉语汉文由“尊严”的“丧失”到地位的逐渐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解构”到“重建”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挫折、扭曲，但复兴“并非梦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语文地位的复兴，取决于国力、取决于经济地位；而汉语本身在必须大开放大吸收的同时，也应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的语文发展方向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实现下列目标,即:“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早已形成,早已取得法定的正宗地位,但它是不是十分成熟了呢?这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961年,赵元任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他的结论是:“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①在当前或者今后,为了汉语的正确,为了汉语的尊严,我们应该做出哪些“绝对的规定”?这也是语文工作者应该探讨的问题。其实,百余年的语文转向,已有不少“绝对的规定”,如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普通话基础方言的规定,普通话的规范与大力推广,汉字形音义的规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等等,正是这一系列规定保证了汉语的转向。

壹、何谓“语文转向” 中国语文为什么要转向

“语文转向”是本文的一个主要概念。为什么我要用“语文转向”这个概念,而不用现成的“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这样一些提法?这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我觉得“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之类的提法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语文转向的实质。

“革新”即“革故鼎新”,即“革除旧的,创造新的”。如“技术革新”、“革新运动”。“语文革新”也可能是由“技术革新”类比而来。二者性质不同,技术可以“革新”,语文不能“革新”。百余年来事实证明,汉语和汉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变化很大,但汉字只是有“改”无“革”,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什么文字来取代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即使作为文字来看待,它也没有取代汉字,在当前连平起平坐也谈不上。至于汉语,它的词汇、语法均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可汉语并没有被革除掉,并没有谁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取代汉语。“语文革新”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严密的。

^①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46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历史不长，很明显它是套用模仿“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类的词语“克隆”出来的。1980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过不定期丛刊《语文现代化》。它的发刊词对“语文现代化”的定义是：“文字改革就是语文现代化。也可以说，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字改革。”^①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它提出的研究课题和奋斗目标，主要是着眼于当前语言应用方面的问题。如推广普通话、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加强现代汉语现代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

上述一刊一会对“语文现代化”的解释就很不一样。这个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颇为流行，但也不是没有争议的。1995年12月23日在南京“语文现代化问题”座谈会上，韩陈其的发言就表示：“语文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还有不少问题。”^②世界各国所有的现代化都是靠两个轮子运转前进的。一轮叫科技，一轮叫人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科技的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国际化，科技作为产业必须跟国际接轨，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人文这个轮子，包括语文在内，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从语文应用层面来看，如汉字信息处理，我们可以称之为“语文现代化”，可汉字、汉语能跟国际接轨吗？能全球化吗？在历史上曾经有人主张废除汉语、废除汉字，以为这样就可以跟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如果连自己的“语”和“文”都没有了，成了“无轨”之人，拿什么跟人家“接”！“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容易导致片面性，即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现代应当继承传统。我们只能用现代的话语体系去解释传统，但不能“化”掉传统。我们不能“化”掉孔夫子，也不能“化”掉十三经、二十四史，也不能“化”掉文言文、

① 参见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366页，语文出版社，1997年。

② 江苏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于1995年12月23日曾举行“语文现代化的问题”座谈会。见郭伯康《中国语文工作者的使命——“语文现代化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3期。

甲骨文、金文，甚至连《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也不能化掉。可见“语文现代化”是一个赶时髦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这个口号既不能准确地对百余年来的语文转型进行历史性的概括，也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指导当前的语文建设。所以，20多年来，这个口号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我个人也决定不采用“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看法，不一定正确。我这样讲，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学术研究允许自由探索，不能只有一个口号，一种主张。

“语文转向”这个提法就对吗？这要由时间来作结论。

从目前来看，这个提法至少有两点好处。

一是摆正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的总目标总趋势无疑是由传统转向现代。具体内容就是：由古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以文言文为正宗转向以白话文为正宗，由以汉语为单一的教学语言转向有附加语言的多元教学语言，由自然“标准语”转向法定的规范化的标准语（普通话），由汉字单一书写体系转向以拼音文字为辅助的双符号书写体系，在印刷文化转向电子文化的时代，汉语也发生了由单一的纸上读写转向纸上和屏幕的双重读写（年轻一代有所谓“弃书投网”的说法），我们说这些都属于“转向”，因为它既没有切断传统语文的命脉，又从传统中孕育出新的发展方向。“转向”当然不是听其自然，有人为的干预，有“绝对的规定”。但不论什么样的“干预”，什么样的“规定”，都必须尊重语文发展的内在规律，它自身的逻辑。所有企图用“革”的办法、用“化”的办法来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矛盾，都是行不通的。传统语文为现代语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是现代语文发展的立足点、基地。“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的提法都没有给传统语文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实空间。

二是摆正了语文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各民族迟早都要随潮流而进。语文转向并不具有“普世性”，也不需要“全球化”。语文转向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了适应世界潮流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在中国现代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大前提，语文转向是

实现这个大前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现代化这股世界潮流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击中国，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处在中世纪的古典语文生态环境中，中国语文就完全没有“转向”的必要，也没有“转向”的可能。中国现代化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障碍。语言文字是我们进入国际社会的唯一方式。郭嵩焘深明此理，故曰：“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①”洋人打上国门，我们被迫跟洋人打交道，打交道就得说话，就得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文化、思维方式。客方的强势语言就必然对我方的弱势语言进行渗透、输入，乃至改变词汇体系、语法规则，形成所谓“欧化”汉语。但不论怎么“欧化”，汉语总还是汉语，这就是语文转向与科技现代化在本质上的不同。

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语文并不一定要急转向，大转向，而汉语面临现代化的大潮，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几千年以来未有的大转向呢？

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原生形态，它的社会转型是从内部发生的，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它的语文演变基本上是自行性的新陈代谢。而汉语遭遇现代化是突发的、是被动的。且汉语汉字的历史极为悠久，文献极为丰富，“语”和“文”又严重脱节，“文”的内容也以古典为主，面对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发展到19世纪的汉语，的确已经老了，“真成了退化的语言。”^②它的老态主要表现在：

一、语文教育老化

中国的语文教育，从西汉到清末，几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语文教育的内容完全脱离实际，完全脱离世界潮流。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语文教育，是为农业社会为宗法制度服务的，在工业时代不能说完全是无用之学，但它的用处在于别的方面，与现代化基本无关。它不能挽救国难于危亡，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不能御强敌于国门之外，不能用

^① 《郭嵩焘日记》，册三。转引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246页，岳麓书社，2000年。

^②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一卷二号，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9年1月）。

经学原理来制造轮船大炮，来识别太阳与地球到底谁绕着谁转。经史子集本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但代代相传，陈陈相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①经典也就成了包袱。晚清的保守派动辄就引用“诗云”“子曰”、引用“夷夏之辨”、引用三纲五常来反对现代化，反对西方文明，反对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思想，恰恰足以证明我们的语文教育已不合时宜，经典本身就面临着重新估价的命运。日本比我们接受西学要晚，而现代化的进程比我们快得多。我们的觉醒比日本早，当魏源编著《海国图志》（1842）时，美国人还没有打开日本门户^②、明治天皇（1852 - 1912）还没有出生呢^③。而日本一旦觉醒，就很快地被人称为“戏剧性地”实现了工业现代化。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经典包袱太重太重。用经典教育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绝大多数头脑僵化，思想糊涂，几成废物。有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人才。旧式的中世纪的汉语教育怎么可能塑造出现代性的国际性的人才呢！这一条说的就是供人们学习的书面语言已经老化，从中得不到近现代的思想、信息和社会改革知识以及科学知识。

二、书面话语老化

人们学的是老化了的汉语，用于写作实践的又是老化了的书面汉语，这就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文言文。关于文言文的功过，文言文的现代命运，21 世纪的人们应如何对待文言文等问题，下文还会谈到。但以文言文为正宗，造成言与文严重脱离，这肯定是不好的，是不符合一个现代社会的起码规范的。吴大猷在分析古代中国为什么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时指出：“第一因素，可能是我们从未发展了科学术语——符号——的运用。西方数学的进展，由符号、方程式的引入而突飞猛进。符

① 《韩昌黎集·答李翊书》，第四册，第十六卷，五十八页。商务印书馆。1958 年 8 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② 美国海军军官佩里（Perry, Matthew Cal·braith）率领远征舰队于 1853 年——1854 年迫使日本改变闭关政策与西方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

③ 明治天皇，1867 年即位为日本天皇，1868 年改元为明治。在位期间，进行多种改革，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

号系逻辑思索的最基本的工具。我国的文言叙述，使科学研究结果的传达，极其困难。一个数学家研究所得，往往埋没于著述中。这是我国典籍中有个别的科学结果，而少前后人继续性的发展的原因。^①”吴先生讲的是文言对科技发展的危害。文言的危害不止于此，文言文还影响汉语走向世界，也不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外国人是学习我们的“之乎者也”呢，还是学习汉语的“的了吗呢”呢？一个中国外交官如果说的是“的了吗呢”，而写的又是“之乎者也”，岂不是自找麻烦。即使孔夫子生活在19世纪，也不会赞成用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言来作文的。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②“五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斥“选学”为“妖孽”，贬“桐城”为“谬种”，那是时代的要求。^③不如此，不足以动摇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三、应试文体（八股文）老化

中国历史上的语文腐败大概以八股文为最，其弊与妇女裹小脚相当。妇女裹足，实际上是将妇女视为玩物，摧残其身心，置“半边天”于无用之地，受害的不止是妇女，社会国家有一半人为残废，其损失如何计算！八股文也是摧残人性的东西，明清的有识之士多所揭发，连当时的外国人都深知其害。自封为“美国进士”的传教士林乐知就说：“中国士人……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又说：“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

① 《吴大猷文录》，130，13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② 《礼记·中庸》，见《十三经注疏》下册，16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③ 钱玄同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发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中有“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文现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一卷，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独秀把明代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归有光以及清代“桐城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统称为“十八妖魔”。见《胡适口述自传》，152页。

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闻见矣。^①”举国上下的士人，其手足、心思、耳目均受害于八股文，这跟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八股文美其名曰“代圣贤立言”，实际上就是奴隶语言。数百年间，中国的士人，有几人能做语言的主人？多语言奴隶也。封建王朝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奴隶，奴隶们又使汉语奴役化。结果是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一齐奴役化。

太平天国究竟应如何评价，在此不表。他们对当时的语文状况甚为不满，很想在语文方面实现新的转向，如1853年的《天王诏旨》说：“《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净尽，只留真话正话。^②”被他们斥为“鬼”“怪”“妖”“邪”的究竟是什么“话”，不得而知。但他们敢于向经典挑战，不迷信经典语言，不想再做语言奴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肯定。又如洪仁玕等于1861年发表《戒浮文巧言谕》，乃是一篇批判奴隶语言的不朽檄文。他们主张：“且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尤属不伦，且涉妄诞。”他们要求叙事文章，“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妖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③可惜，太平天国由于自身的腐败，很快就丧失了业已取得的胜利果实，他们也无缘实现新的语文转向，八股文的寿命又延长了几十年，到20世纪初年才和科举制度一

①（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中西关系略论》，原发表于光绪元年（1875）九月十八日的《万国公报》，现收入《万国公报文选》，180页。三联书店，1998年。

② 洪秀全《诏旨》，见《太平天国》，第3册，190页。上海出版社，1957年。《诏旨》中所谓的《诗韵》即《诗经》。洪秀全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乃准阅读。《诗经》改名为《诗韵》。

③ 洪仁玕，蒙时雍，李春发《戒浮文巧言谕》，见《太平天国文选》，又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上），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起呜呼哀哉。^①

四、缺少语言规范

一个现代社会，应当有经过政府规范的民族共同语，这是一个民族走向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汉语在周代就已经有了“雅言”，汉代也称之为“通语”，明清时代又有“官话”、“正音”，这些称谓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不同的是所谓“雅言”“正音”都是自然形成的。不像“普通话”，有明确的方言基础，有严格的语音规范，有详明的能用字母标记的语音分析。普通话是具有法定地位的个人无权随意解释随意变更的权威性语言，是本国人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语言。19世纪的汉语还处在无规范的落后状态中，从无规范走向有规范，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语言转向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居第一位的大国，各地方言土语极为复杂。北方人与吴语、闽语、粤语区的人几乎无法交谈。这是农业社会的特点。社会要开放，要搞活，方言土语就是一大障碍。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许多人就是以自己的方言进入世界的。各方言区之间的人不能操普通话往来，甚至只能以英语作为媒介。清代某些有进士举人文化程度的闽广官员不能与大清皇帝对话，皇帝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据王照说，梁启超就因为“不会讲官话，口音差池，如读孝字为好，读高为古，于是君臣间相对，无法传达意思，光绪很失望，仅赐梁六品顶戴”。（《梁启超传》1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语言统一，推广普通话，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语言不畅通，势必造成诸多不便，封建时代、军阀割据时代、社会封闭时代，问题不大。社会分裂混乱，语言必然分裂混乱；语言落后无序，正反映社会落后无序。

^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初五日（6月23日）谕：“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清廷规定：“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五、语言观老化

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对语言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有许多论述，语言的崇高地位得到充分肯定。而中国长期以来只重视个人言语，不重视民族语言，根本缺少民族语言观传统，也缺乏语言开放意识。

语言是全民共有的财富，是无阶级性的，而中国士人的言语观，在19世纪以前甚至在20世纪初叶，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强烈的保守倾向、等级倾向。

从周朝以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把言语视为荣辱之枢机。有利于统治者的话招来荣（也不尽然），不利于统治者的话招来辱。或者说统治者爱听的话招来荣，统治者不爱听的话招来辱。刘向《说苑·敬慎》第25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①

祸从口出，故中国的士大夫，在言语问题上，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孔夫子以为“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非也，事有大谬不然者。多少“行身如此”的人最终还是掉进了“深渊”，清代的文字狱并不是太遥远的事情，因株连而进入“深渊”的人可不在少数。

嵇康的脾气，鲁迅认为“始终都是极坏的。”^②可我们读他的《家诫》，在言语问题上是多么谨小慎微。在理论上他也认为：“夫言语，

① 刘向《说苑·敬慎》。见赵善诒《说苑疏证》，29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3），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